

【最新修订版】

紅旗照相館

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

晋永权◎著



Red Flag Studio

Debates on China's Photography 1956—1959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紅旗照相館

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辯

晋永权◎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旗照相馆：1956—1959 年中国摄影争辩 / 晋永权

著. —2 版.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1

ISBN 978-7-5155-0898-6

I. 红… II. 晋… III. 新闻摄影 - 摄影史 - 中国 - 1956—1959 IV. ①J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2724 号

红旗照相馆——1956—1959 年中国摄影争辩

作 者 晋永权
责任编辑 谢艳芝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2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898-6
定 价 54.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22699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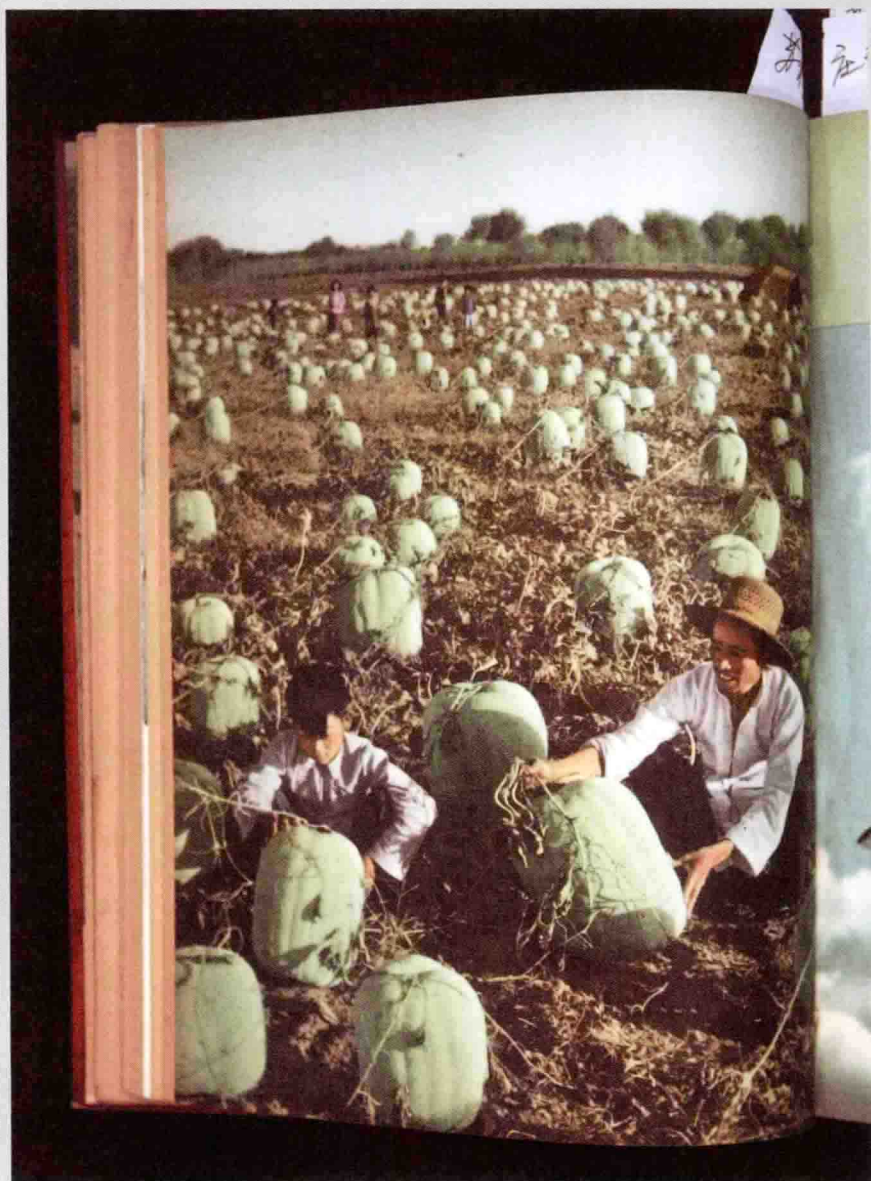


节日的欢腾（集体署名）*

资料来源：
《中国》画册
《中国》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1959 年

一张增添了诸多人工痕迹的照片，包括天上的汽球。用于渲染节日气氛。

* 《中国》画册初版于 1959 年。因画册未在每张照片下列出拍摄者姓名，而是以“集体署名”的方式置于书后，故本书对引自其中的图片也以“集体署名”的方式标注。



种瓜得瓜

盛果\摄

资料来源:

《新闻摄影》

1958年第1期封底

当年反映农业丰收的典型照片，上图中的冬瓜多为移植，带有明显的加工痕迹。



老猎人

正 威\摄

资料来源:

《摄影艺术选集》

摄影艺术展览会编辑组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展示一下狩猎成果，辅以笑一笑。这与当年农业报道中的“抱一抱，笑一笑”如出一辙。



大凉山下春耕（集体署名）

资料来源：

《中国》画册

《中国》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1959 年

呆板、僵硬的摆布照片。
可以看出人物是按照拍摄要求
穿上新衣的。



人民公社的羊群（集体署名）

资料来源：

《中国》画册

《中国》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1959 年

摄影者一般都会挑选风景恰到好处
的地方拍摄此类照片。



拼接前的样片，来自不同场景。



喜迎春

舒野\摄

资料来源：

《中国青年报》图像库

《中国》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1962年2月

完美的画意，浪漫的拼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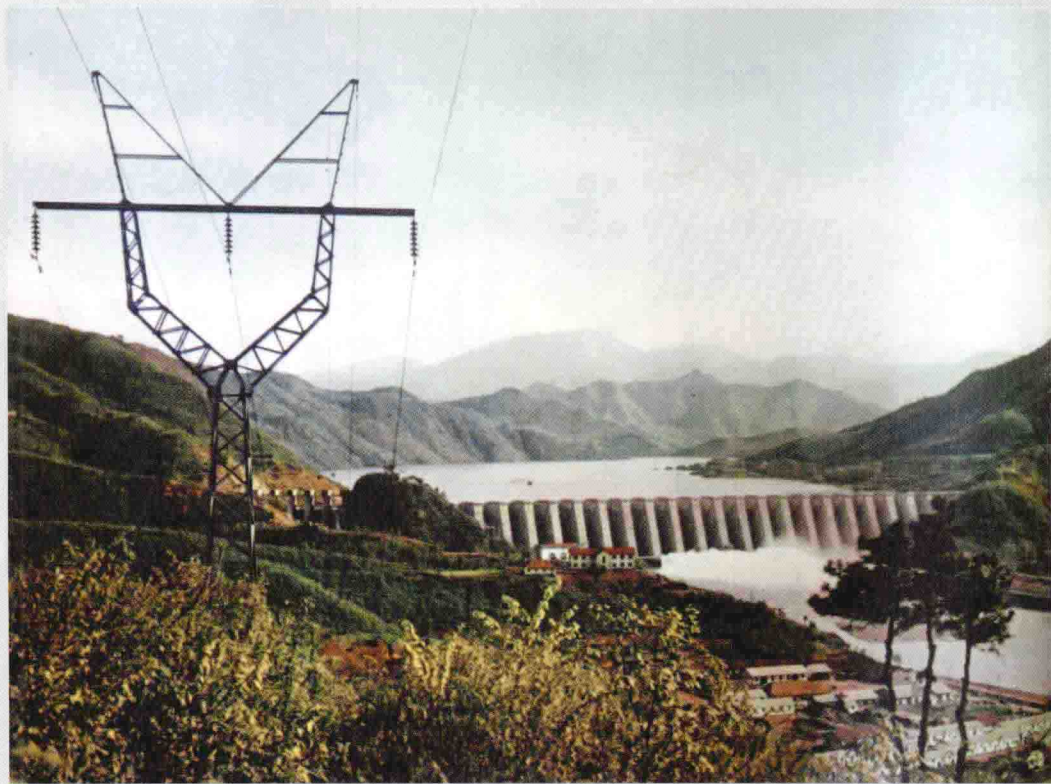
可视作当年组织加工与摆布的浪漫范例。



棉花姑娘

照 耀\摄制
资料来源:
《大众摄影》
1959 年第 7 期

一张歌颂棉花丰收的图片，
在摄制者的精心剪接、修饰下
而成。



安徽佛子岭水库（集体署名）

资料来源：

《中国》画册

《中国》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1959 年

主体之前，加上说明问题的漂亮前景，造成建设成就风景如画的感觉。



女工（集体署名）

资料来源：

《中国》画册

《中国》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1959 年

人+机器。工业题材摄影
中惯用模式。



12224



摄影师在湖南莲塘坳人民公社抢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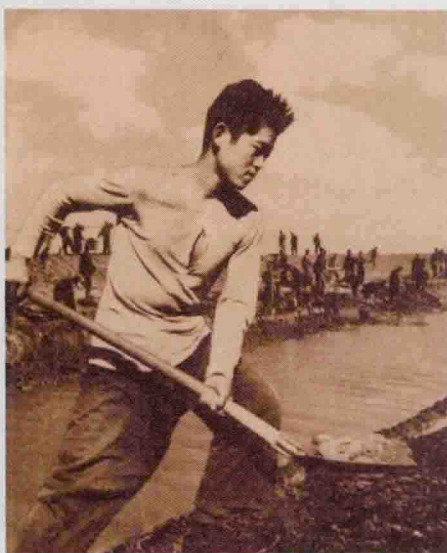
潘 英\摄

资料来源:

《中国青年报》图像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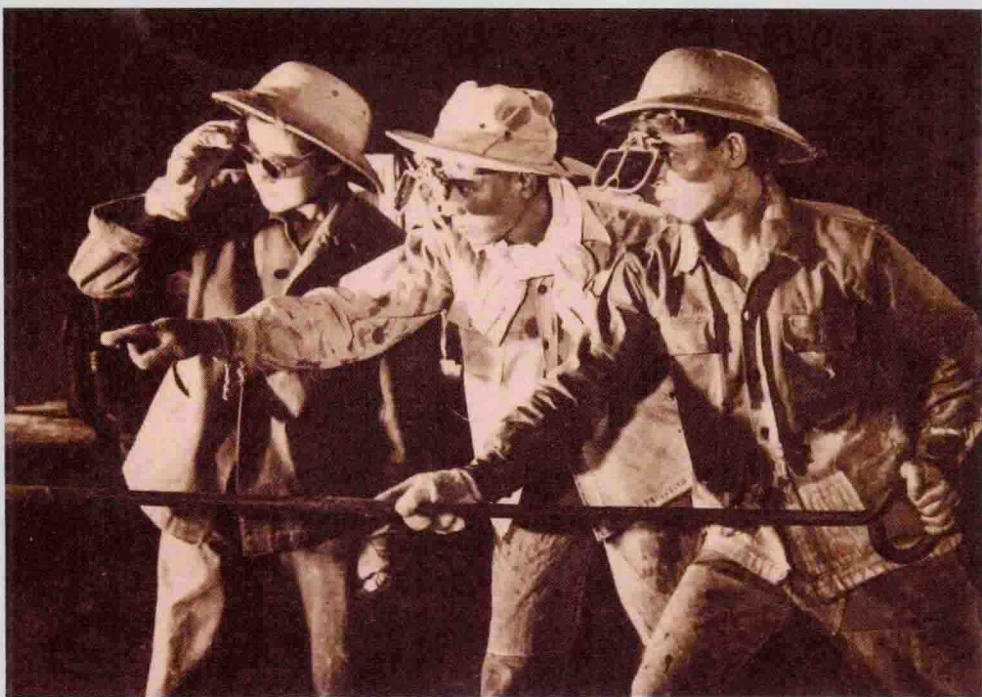
1959 年 7 月

此张照片非常难得地再现了摄影师拍照的现场，及拍摄出来的照片。一旁协助拍摄的人，用席子作为反光板。



兴修水利

资料来源：
《中国青年报》图像库



穗港澳摄影家作品展览 7172 号作品

资料来源：
《中国青年报》图像库
1957 年 3 月

一张充满诗情画意的工业题材照片。这一时期展出的穗港澳摄影家作品，对其后几十年中国大陆摄影人影响颇深。



晒谷（集体署名）

资料来源：

《中国》画册

《中国》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1959 年

犹如绘画一般的透视，劳动的人，劳动成就与宽阔农田。这已经成为农业报道的模式之一。

序

新闻摄影的双重剪影

——读《红旗照相馆——1956—1959 年中国摄影争辩》

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新闻摄影的政治属性和专业属性的关系是半个世纪来反复呈现的议题，《红旗照相馆——1956—1959 年中国摄影争辩》的作者在第一版自序中对此的解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职业伦理的政治反思，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专业文化的史学考察：“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激烈争辩过的问题是如此深刻地影响、规定着今天的行业话题、从业规划甚至人情世故。这些遥远的争吵感叹声，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穿越时空，成为今日仍时时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最初的争论是那样的真诚、惊心动魄乃至冷酷无情，其遗产越过新闻摄影行业，成为中国大陆整个摄影界，乃至整个国家影像文化生态的主导部分。”如此令人一唱三叹的感想来自于全书的五章或者说五个板块：“风生水起”是关于新闻摄影中的“组织加工”与“摆布”的讨论如何上纲上线，“左叶事件”是 1957 年新闻摄影界意识到组织意识高于职业意识的分水岭，“跃进中”的图片作业终于让视觉形象成为政治物理学的装置，“叛逆者失踪”过程中的论辩回合给新闻摄影的专业主义划上休止符，“浮云望眼”中对外国摄影文化的参照不过是按照国际政治的氛围不时调焦的手段。纵观而言，这本书讨论了中国当代新闻摄影史上的两个重要议题，一是新闻摄影的传播属性之争，二是新闻摄影的传播者是否有过自觉或不自觉的专业主义意识。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

2

新闻摄影的政治身份

作为传播的产物，照片的传播效果不仅仅是图像的可靠，更牵涉到图像与图像之外的社会关系。根据作者的考察，“新闻摄影”的概念从1949年以后“经历了一个新的形成、修正期，并且逐渐被赋予了诸多特殊内容的过程”。从1952年起，关于新闻摄影的“摆布”、“组织安排”、“虚构”、“造假”等问题就在新闻摄影局及其后成立的新华社摄影部内展开讨论。

对问题的讨论一开始是图像的真实性。引发真实性的案例有大有小，从1956年北海公园儿童车事件，到包兰铁路昆都仑河大桥，还有一汽工厂的摄影报道。如果不考虑新华社关于“组织新闻，参与事实”的讨论背景，每个事件里当事人对自己的解释都是成立的。如果把这些事件放在一个传播效果优先的前提下，当事人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但是，1956年初夏发轫的这些事件和讨论逐步显现出命题本身的复杂性，逐渐拉开中央和地方、官方和个人、政治和业务的距离。

从书中提供的信息来看，最初的讨论在专业范围内是可以成立的。讨论的延伸涉及新闻真实性如何在新闻摄影中存在，“虚构和摆布”与“正确的组织加工”其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组织加工”这个词被修饰，增加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形容词，其操作的实质是将比虚构与摆布外延范围更大的组织加工收归己有：正确的组织加工，才是被许可的。而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组织加工，几乎找不到准确的说明。1956年3月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编委会的“决定”中提出的令人左右为难的要求：“作为一个好记者，必须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去发掘，去观察，而尽量不依赖组织加工……而如果需要组织加工，应该提倡事先组织，尽量避免现场组织。”事实上，在当时不管是反对还是赞成，或者是在两者之间游离，最终俘获人心的工作方式还是彼此“心照不宣”这样一种现实。

当然，亦有人提出“新闻摄影创作方法的根本特点，不是什么‘组织加工’和‘摆布’，而是选择”。最能体现新闻摄影特征的，是时事政治新闻的采访。的确，在重大外事场合，摄影记者不可能进行现场调度。这里起作用的是被拍摄对象本身的传播价值，比如书中提及的“毛泽东特例”。毛泽东和青年在一起、毛泽东看世界地图、毛泽东